

杨 朔

茶
花
赋

学小丛书 · WEN XUE XIAO CONG 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茶花赋

杨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封面设计： 伍 端 端

茶 花 赋
Cha hua f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山 东 省 威 海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66,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3 \frac{1}{2}$ 插 页 2

1985 年 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5 年 1 月 威 海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47,500

书 号 10019 · 3755 定 价 0.52 元

前 言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一九一三年生于山东蓬莱县，自幼喜爱文学，青年时期作过翻译出版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革命，一九三九年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解放战争开始，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这期间写了许多散文、特写、战地通讯和中、短篇小说。建国后担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文艺部部长，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〇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一九五四年归国，在中国作家协会负责外事工作。这以后，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描绘祖国自然风貌和反映亚非人民生活的优秀散文。这样一位勤奋而有才华的作家，不幸于一九六八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杨朔一生写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最有成就并得到大家公认的是散文。他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总是象写诗那样，再三剪裁，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正因为如此，结构精巧，层次分明，语言精炼和诗情画意，便构成了杨朔散文的独特风格。杨朔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有敏锐

的政治洞察能力，他长期同工农兵战斗在一起，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浓郁的时代色彩。

《茶花赋》这本散文集子，是从杨朔所有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其中《铁骑兵》、《英雄时代》、《海市》、《荔枝蜜》、《茶花赋》、《樱花雨》、《生命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目 录

雪花飘在满洲	1
潼关之夜	9
铁骑兵	15
春在朝鲜	18
平常的人	22
英雄时代	27
戈壁滩上的春天	33
京城漫记	38
香山红叶	43
海市	47
荔枝蜜	57
茶花赋	61
秋风萧瑟	65
画山绣水	70
西江月	75

——井冈山写怀之二

金字塔夜月	80
樱花雨	85
宝石	90
赤道雪	94
生命泉	105

雪花飘在满洲

你还记得小卞么？朋友们全说他有神经病。

八·一三事变不久，他忽然离开上海，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我才接到他的一封信，从山海关寄来，原来他正设法要回满洲去。

你感觉他的行动奇怪么？其实据我看来，他并没有神经病，不过感情太盛，有时会迷失了他的理智。他所以冒着绝大的危险要回满洲，无非想看看他的父亲和母亲，虽然这种行动是拿着自己的性命来作赌注！

在山海关，他就遭受一次凌辱，事情的经过全写在他给我的信里。

于今，一个人想进满洲，必须拿着“入国证”，而这种“入国证”多半是当事人出境时向当地的伪政府机关事前办理妥当的，如果先前不曾在东北有过什么关系，想要弄到“入国证”，那就十分困难了。小卞听说山海关有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大东公司，专门办理入满手续，不限制劳苦群众出关，经过一番化装，他就出现在大东公司的办公室里。

“到满洲国干什么？”一个日本人操着国语问他，态度当然很蛮横。

“看我父亲和母亲。”

“在关里做什么事？”

“天津小饭馆里跑堂。”

日本人抬起两只菱角形的贼眼，从上到下打量着他：他已经把眼镜摘下，头上戴着狗皮帽子，蓝布棉袍和青布深脸棉鞋都是从估衣铺买来的。

日本人突然跳起来骂道：

“王八蛋，你想骗谁，看你的样子就不象！”

拳头、皮鞋，雨点似的落到他的头上、背上、腿上。……他抱紧头窜到门外，最后屁股上还吃了一脚。可是他在信尾仍然这样写着：

“不管怎样困难，我一定要回满洲，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六十岁以外的老人了。我想念他们……”

请你不要过分苛刻批评他，也许他是糊涂，但他决不是害着精神病。以后，他的消息又断绝了，没有信来，没有人提起他。朋友们全以为他死了，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可是，他忽然在上月回到汉口，新从满洲来，身上仍然穿着那一套怪难看的化装衣饰。

满洲的情形和你我在那边的时候完全不同了。他带来许多痛心的消息，我当然要告诉你，可是别焦急，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是啦，让我继续方才的话来讲吧。

他弄不到“入国证”，蹲在山海关一家小店里，愁苦，无聊，整天地喝酒。

岁暮了。一天，他因为喝了过量的酒，伏在炕上哭起来，客店的老板走进来问：

“别难过了，老客！你是哪里人？”

“海城。”

“海城，我们还是老乡呢。先前我不知道你的心事，方才茶房统统告诉我了。别哭啦，我在地面上还熟，可以帮忙你买到一张‘入国证’，你能付十元钱不能？”

“二十也可以，只要办得到……”他跳下炕来，抓住老板的手，酒醉完全消失了。

于是，在一个风雪的早晨，他爬进“奉山路”的三等车厢，拖着一颗创痛的心，投进满洲的怀抱。

大片的雪花飘落着，平原，村舍，白蒙蒙的一片，多么圣洁啊，满洲！不，一点都不圣洁，它只是一个被仇敌肆意蹂躏过的少妇，裸露着整个的肉体，喘息，呻吟，挣扎在耻辱和血污里！

旅客大半是骄横的日本人，高声说笑着，没有谁理他，他是条狗！车里虽然有几个中国人，偶而彼此对望一眼，但他们不敢交谈，因为车里常有便衣侦探，谁也不敢相信对方是不是好人。

到海城了，他却不敢回家。他的家在城里，耳目太多，恐怕闲人把他回来的消息传扬开去。他踌躇在车站里，终于提着简单的行囊走到他舅父那里。这个老人住在一座小小的村落，离城二十多里路。

你可以想到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刹那，当他舅父赶着

骡子把他母亲从城里接来。这位老妇人太兴奋了，挥洒着快乐的眼泪，没有人能够听懂她在说些什么。最后，她仿佛一下从恶梦里惊醒，抖颤着声音说：

“你怎么敢回来啊，孩子，鬼子要你当兵，要了多少次……我说‘他在北平病死了’，可是他们不信，还是常到咱们家里闹。你难道没接到我的信，叫你连家信也别写！这个时候，你倒敢回来送死……啊，怎么好，怎么好？……”

小卞一点不知道这些事，他呆了。舅父的头脑还算冷静，寻思着说：

“孩子来了，就让他乡下悄悄住两天，不过千万别出门去！”

这天夜晚，吃过高粱米饭后，小卞和他母亲、舅父，还有一到冬天就害喘病的舅母，围坐在热炕头上，谈论着家乡的事情。舅父的话说得最多，叹气的声音也比旁人格外粗重。的确，满洲的情形太坏了，你听后也免不了要叹一口气。

“国防线区”，这个崭新的名词，于今已经被每一个东北农民所熟知了。现在，凡是富庶的城市，全划入“国防线区”之内，一二年内，整个满洲不会再有一片土地属于农民的了。这是一种阴毒的以华制华的政策，七·七事变以后才实施起来的。开首，狡猾的日本人先把每家的地产调查清楚，实行土地登记，等到粮食收成时，估计你全家人在这一年中总共需要多少食粮，剩余的出产便完全吸收进伪满政府所设立的合作社仓库之内，答应付给你相当的代价，但这不过是不负责任的骗人的话。满洲的土地那么辽阔，地产那么富

足，经过这种统治方法，巨量的食粮可以立刻积电起来，拿来应付中日战争的非常时期的需要。

日本人还在乡间征兵，弟兄两个去一个，把这些乡村青年驱逐到山西、山东、江苏，……逼迫他们同本国的同胞互相残杀，假设日本人认为你的行动有一点“叛变”的可疑，立刻就会杀死你，而且要严酷地处置你的家族！因此，许多勇敢的青年逃走了，逃到深山大泽，加入义勇军，举起反满抗日的正义的大旗！义勇军，这一把燎原的野火，从九·一八到现在，无论日本兵使出何种灭绝人道的办法，始终不能扑灭他们，他们的斗志反而更盛。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把万恶的日本赶出满洲，然而他们正象早春的野草，到处潜伏着茁壮的新芽，时机一到，就会负担起收复失地的伟大使命。

两星期过去了。这一天，小卞准备离开家乡。他母亲、舅父和舅母为了爱他，不敢留他多住。他们把他送到村头。他母亲拄着拐杖，白发飘舞在北风里，抹着眼泪对他说：

“去吧，孩子，不要想念你的妈妈，你妈妈也不想你，来生来世，咱们娘俩总有再见的日子！”

咬紧牙，一口气跑出两三里，头也不回，但是眼泪滴到他的衣襟上，已经冻成许多点明洁的冰花了。

可是不曾立刻离开满洲。他跳上北行的火车，去到久别的哈尔滨，他想看看他的爸爸，一位年老的糖商。

五年前，他在哈尔滨一家报馆作编辑，为了“反满抗日”的嫌疑，曾经被捕入狱。侥幸他父亲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关系，把他保释出来，然而当时日本宪兵队提出一个条件：每

天他必须到宪兵队报到，证明他不曾潜逃；后来改作每星期一次，又过些日子，假托养病的理由，他才离开满洲，去到上海。于今五年了，当他第二次踏到松花江上，一切都变得那样不同。他借住在一位亲戚家中，不敢睡在父亲的店铺里。他好象一只蝙蝠，白天潜伏着，夜间才敢遮掩在黑暗的阴影下，来去在热闹的市街上。中央大街依旧可以见到许多流落的白俄，然而哈尔滨的俄国风味已经逐渐减低，处处都在显露着极端的日本化。玲珑而类似玩具的日本式楼房，繁荣的日本商店，酗酒的日本流氓，高髻的日本妇女……这一切，使得他头痛，晕眩！路上，他很少见到中国青年，他们大半逃亡了。他迈进一家有名的中国商店，内部竟是那么冷清，往日的热闹市场全被日本商店剥夺净尽。从当地出版的报纸上，他读不到许多记载中日战争的消息，一些无线电的重要报告却是普遍地流传在人们的嘴上。军事上暂时的失利，并不曾使满洲的同胞对于祖国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潜在的反日情绪更加沸腾，热烈地期待着民族解放那一天的到来。

在哈尔滨的第二天，他父亲慌慌张张跑来说：

“你快走吧，日本人又追上你了。今天来过几个宪兵问我：‘你儿子回来了么？’——‘没有啊。’可是他们不信，在我的商店好搜。”

日本侦探的嗅觉真象猎犬一样的敏锐，他们当然是接到山海关伪警察署的报告了。现在，“满洲国”一共有三种良民证明书，那是“入国证”，“旅行证”和“迁移证”。小卞的

“入国证”仅仅是到海城，他却跑到哈尔滨，这种冒险举动未免太不值了。

第三天，他跳上“中东路”改名的“北满路”客车，蜷曲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在沈阳换一次车，经过山海关，一直到达天津，路上不曾受到一回检察。

你以为他是平安了！其实不然。这儿还有一次危险等待着

他住在天津英租界，等候一天，买到一张怡和洋行开往上海的轮船票，从租界码头上了船。开船那天，风色十分阴沉。他挤在黑暗嘈杂的统舱里，挨近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

“上哪去呵，老太太？”他对老妇人问。

“回山东家去。”老妇人也是一个人走路，不到一刻，他们便成为很好的同伴，亲切地交谈着。

驶近塘沽，轮船停下了，走上一个日本宪兵和几个伪政府的警察来检验旅客和行李。

日本宪兵走在头前，眼睛仿佛两道电光，四下搜寻着，忽然停在一个白皙的穿着古铜色皮袍的青年旅客身上。

“你到哪去？”他凶狠地用中国话问。

“上海，”旅客有点不安。

“天津作什么事？”

“开绸缎庄。”

“扣住他！”日本宪兵掉转头对警察说，“上海人统统反日！”一闪，宪兵的眼光刺到小卞的脸上，机械地问：

“你到哪去？”

“我……山东！”犹豫的态度惹起宪兵的怀疑。他直盯着小卞的眼睛，伸出右手，冷酷地说：

“给我票看看！”

小卞的心往下一沉，头脑昏胀起来。他的手伸在衣袋里摸索着，听见宪兵又在大声吆喝说：

“混蛋，快拿出票来！”

他的手指抖颤着，象是行刑前的死囚，脸色转成苍白。

“看吧，老总，这是我的票——他是我的孩子。”小卞身旁的老妇人忽然插进嘴来。转过脸，她又用谴责的语气对小卞说：

“你把票弄到哪里去了，赶快找找。长到多大，还是这样不小心！”

是这样，他才从魔鬼的指缝间遗落下来，直到轮船驶出大沽口，才大胆地吸进一口自由的空气。

你一定还以为他有神经病。他的无谓的冒险举动，当然称不起勇敢，但我不同意你的话。我说：他实在是个感情超过理智的人。

一九三八年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么？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的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青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青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更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问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象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